

CATALOG OF ANIMAL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故宫经典

清宫兽谱

故宫博物院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ANIMAL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清宫兽谱



故宫博物院 / 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兽谱 / 袁杰主编.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4.9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417-4

I. ①清… II. ①袁… ②故… III. ①工笔画—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4266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 季 王亚民
委 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 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 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 杨 娄 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兽谱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袁 杰
点 校：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组长 冯祚建
组员 王祖望 马逸清 全国强
图片资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摄 影：余宁川
影像提供：周耀卿

出 版 人：王亚民
责任编辑：江 英 宋 歌
装帧设计：李 猛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34.5
字 数：70千字
图 版：200幅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417-4
定 价：360.00元

目 录

006/	前言
014/	《兽谱》物种考证纪要
022/	《兽谱》第一册
086/	《兽谱》第二册
150/	《兽谱》第三册
214/	《兽谱》第四册
278/	《兽谱》第五册
342/	《兽谱》第六册
408/	《兽谱》物种考证
414/	点校说明、出版后记

故宫经典 CLASS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CATALOG OF ANIMALS COLLECTED IN THE QING PALACE

清宫兽谱



故宫博物院 / 编
COMPILED BY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宫兽谱 / 袁杰主编. 故宫博物院编. — 北京 : 故宫出版社, 2014.9
(故宫经典)
ISBN 978-7-5134-0417-4

I. ①清… II. ①袁… ②故… III. ①工笔画—翎毛走兽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4266号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单霁翔
副主任 李 季 王亚民
委 员 （按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冯乃恩 任万平 纪天斌 杨长青 余 辉 宋纪蓉
宋玲平 张 荣 陈丽华 赵国英 赵 杨 娄 玮
章宏伟 阎宏斌 傅红展

故宫经典
清宫兽谱
故宫博物院编

主 编：袁 杰
点 校：张圣洁
物种考证专家组：组长 冯祚建
组员 王祖望 马逸清 全国强
图片资料：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中心
摄 影：余宁川
影像提供：周耀卿

出 版 人：王亚民
责任编辑：江 英 宋 歌
装帧设计：李 猛
出版发行：故宫出版社
地址：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100009
电话：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010-65129479
网址：www.culturefc.cn 邮箱：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12
印 张：34.5
字 数：70千字
图 版：200幅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978-7-5134-0417-4
定 价：360.00元

经典故宫与《故宫经典》

郑欣淼

故宫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文化。从故宫的地位、作用及其内涵看，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宫、皇权为核心的帝王文化、皇家文化，或者说是宫廷文化。皇帝是历史的产物。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核心。同样，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是国家的中心。故宫文化不是局部的，也不是地方性的，无疑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堂皇的部分，但是它又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故宫文化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象征性的特点。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希腊一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故宫文化是经典文化。

经典具有权威性。故宫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它的地位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经典具有不朽性。故宫属于历史遗产，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已的创造和精神，具有不竭的历史生命。经典具有传统性。传统的本质是主体活动的延承，故宫所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

今天的文化建设是相连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

对于经典故宫的诠释与宣传，有着多种的形式。对故宫进行形象的数字化宣传，拍摄类似《故宫》纪录片等影像作品，这是大众传媒的努力；而以精美的图书展现故宫的内蕴，则是许多出版社的追求。

多年来，故宫出版社（原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好的图书。同时，国内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故宫博物院编写的许多好书。这些图书经过十余年甚至二十年的沉淀，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故宫经典”的印象，成为品牌性图书。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模糊起来，而是历久弥新，成为读者心中的经典图书。

于是，现在就有了故宫出版社的《故宫经典》丛书。《国宝》、《紫禁城宫殿》、《清代宫廷生活》、《紫禁城宫殿建筑装饰——内檐装修图典》、《清代宫廷包装艺术》等享誉已久的图书，又以新的面目展示给读者。而且，故宫博物院正在出版和将要出版一系列经典图书。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对故宫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故宫经典》丛书的策划，这无疑是个好的创意和思路。我希望这套丛书不断出下去，而且越出越好。经典故宫借《故宫经典》使其丰厚蕴含得到不断发掘，《故宫经典》则赖经典故宫而声名更为广远。



目 录

006/前言
014/《兽谱》物种考证纪要
022/《兽谱》第一册
086/《兽谱》第二册
150/《兽谱》第三册
214/《兽谱》第四册
278/《兽谱》第五册
342/《兽谱》第六册
408/《兽谱》物种考证
414/点校说明、出版后记

绘制《兽谱》是清代乾隆时期一项浩大的文史工程。它肇始于乾隆十五年(1750),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完成。计绘有瑞兽、异兽、神兽以及各种普通类动物一百八十幅,并对每一种动物的名称、习性与生活环境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动物图志。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可谓集前人之大成,为我们探求动物的生活习性,了解它们的历史演变、地理环境、神话传说,以及清廷与动物产国之间的交往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与科学价值。此外,《兽谱》由当时著名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绘制完成,继承了传统写实风格,并融入西洋绘画光影技巧,描绘精湛,栩栩如生,既是清代宫廷绘画的精品,也是工笔画的杰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一 《兽谱》产生的社会背景

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1736—1795),宫廷画院非常重视以风土人情、历史事件、苑囿风光、飞禽走兽、花卉草虫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创作。清胡敬《国朝院画录》序曰:“国朝踵前代旧制,设立画院,凡象纬疆域,抚绥挞伐,恢拓边徼,劳徕群帅,庆贺之典礼,将作之营造,与夫田家作苦,藩卫贡忱,飞走潜植之伦,随事绘图,昭垂奕祀。”^[1]其中“飞走”即指飞禽走兽类。因此,在乾隆朝出现《鸟谱》《兽谱》《鸽谱》等一批别开生面的院画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纪念意义。这些画谱的出现,令乾隆赏心悦目,裱为珍品收藏,绝非偶然,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及现实意义。一方面,乾隆帝秉祖、父辈之余荫,励精图治,使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化发展、军力强盛、版图不断扩大,边疆少数民族陆续归附,清朝统治达到鼎盛。正如《兽谱》后跋所说:“若夫神武丕昭,德威遐鬯,讲

武吉林,壹发而写黄罴之状;回部向化,底贡而图天骥之材;绘事所垂,悉皆征实。……”意思是:至于清军军力强盛,德育武威传扬远方,乾隆帝至吉林巡狩,一箭射死黄罴的情况;还有新疆回部归顺,进贡天骥良马的题材,都画在里面,均确有其事的。乾隆十九年(1754),发生了准噶尔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归降的重大政治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出兵新疆平准、回二部,西域各部频频来朝,进贡马、犬、象、鹰鹞、瑞鹿以及奇花异草等;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木叛乱势力覆灭,南山北路遂皆入版图。乾隆帝为了庆祝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及政治活动,让郎世宁和一些宫廷画家等描绘了这些事件的某些情节,并将接待、册封四部首领及官员们而隆重举行的纪念活动,都绘录下来。乾隆帝既是一位雄心勃勃、勇于进取的君主,又是位诗、文、史、书、画无一不能的博学之士。《兽谱》是宫廷画家按照乾隆帝的要求,迎合他的爱好画成的,目的是以“百兽呈祥”来彰显其国家富强、抚有四海、万国来朝的景象。

另一方面,《兽谱》的绘制与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文网甚密有关。康、雍、乾三朝,虽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盛世之一,然而在文化领域中却屡兴文字狱,尤以乾隆时期最为繁剧。文人学士为避开敏感领域,多投身于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研究及词章八股的钻研之中而鲜抒己见,故而考据之学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主流。清代考据学家的学术贡献表现为:“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小学”,原指文字学,后来成为文字、音韵、训诂三学的合称。其学者认为,做学问首先必须从文字开始,考据学的基本功就是文字学。将“小学”的方法推而广之,对世间诸事诸物的名实源流详加考证,最终形成了乾隆

[1] 《胡氏书画考三种·国朝院画录》第1页,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据胡氏原刻本影印。

[2] 《鸟谱》跋文见《石渠宝笈续编》，第5册，第189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下同），第22册，第565页。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6册，第720页。

[5] 杨伯达：《清代院画》第66页，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

[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第208页。

时期繁盛一时的考据学派。乾隆帝本人也十分热衷并精通考据学。乾隆朝宫中出现《鸟谱》《兽谱》《鸽谱》等一系列观图辨物的图谱，与《尔雅》《说文解字》等典籍中的考据方法一脉相承。它们也是当时考据学的重要成果。因此，《兽谱》又是一部考证详实的、在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动物图志。它除有显扬国威的作用外，也为皇室了解各种动物的种类、名称、生理特征和栖息环境等知识提供了教材。

二 《兽谱》的绘制经过

《兽谱》无画家款识，但后跋称：“《兽谱》仿《鸟谱》为之。名目形相，盖本诸《古今图书集成》，而设色则余省、张为邦奉敕摹写者也。图左方清汉说文，臣等承旨缮译。及始工藏事月日，并与《鸟谱》同。……既装池进呈，复命臣等勘正之。谨识缘起如右。臣傅恒、臣刘统勋、臣兆惠、臣阿里衮、臣刘纶、臣舒赫德、臣阿桂、臣于敏中恭跋。”可知《兽谱》是仿照《鸟谱》的体例和样式而编辑的，其内容则是由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奉旨按照《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中百兽的形象绘制的。其绘制的起止时间都和《鸟谱》一样。据《鸟谱》跋曰：“右《鸟谱》十二册，为图三百有六十。内府旧藏故大学士蒋廷锡设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摹绘。并命臣等以国书译图说，系于各帧之左。迄辛巳冬竣事，装潢上呈乙览。”^[2]可知《兽谱》始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完成于隆乾二十六年（1761）。《清档》中，虽没有看到《兽谱》开始绘制的时间，但有以下记录：“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余省绢画《兽谱》一百八十张。传旨：配矾白绢一百八十块，着翰林们写对题，得时交启祥宫裱册页六

册。钦此。”^[3]可知这一年《兽谱》已画完，待写对题及装裱。又，《清档·如意馆》载：“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军机处交来绢画《兽谱》一百八十张，绢字《图说》一百八十张；绢画《鸟谱》二百一十张，绢字《图说》二百一十张。传旨：着将《兽谱》裱册页六册，《鸟谱》裱册页七册。钦此。”^[4]可证《兽谱》是与《鸟谱》同时完成的。

清廷向有重视兽类绘画的传统。事实上早在《兽谱》绘制之前，清廷已有许多有关兽类绘画的记录。如雍正经常命郎世宁对边疆少数民族王公、地方大使或外国使臣所进贡的鹰、犬、猿、马等珍禽异兽写生^[5]。《清档》曰：“雍正元年记载：五月初四，怡亲王交商喜画《百兽写生真迹册页》一册。王谕：嗣后凡写百兽，俱照此样画，遵此。”同年，怡亲王允祥曾命人仿画过百兽图。雍正三年记载：“五月十九日，庄亲王传旨：着郎世宁照暹罗国（按今泰国的旧称）所进的狗、鹿每样画一张。钦此。”“九月初四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太监张起麟传旨：着将郎世宁画的老虎取来朕看。钦此。”乾隆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传旨：有郎世宁所画百兽小扇十柄，着配象牙箍、楠木胎黑漆扇匣”^[6]。此类记载在《清档》中甚多，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兽谱》则是此类绘画的集大成者。

三 《兽谱》的现状

《兽谱》共分六册，每册三十幅，共一百八十幅。每幅尺寸及装裱形制均相同，纵40.2厘米、横42.6厘米，绢本，设色。各开背面有裱前编号，按序编排成册。所绘各兽均能独立成幅。图册为蝴蝶装，左右对开式，右为兽图，左为配有满、汉两种文字的说明，详细记录了各种瑞兽、异国兽及普通动物的形貌、声音、秉性、产地等。《兽谱》第

一幅铃“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重华宫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诸印章；中缝铃“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印三；每册最末开铃“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方朱文方玺。

图册夹板为金丝楠木制作，纵52厘米，横50.5厘米。每册的上夹板有隶书阴刻填蓝色字“兽谱”。上夹板右下角粘有原编号“成一七八13—17，成一七七5”及“教育部清点委员会”签和“教育部点验之章”。“成”字号文物为斋宫物品^[7]，但在《抚辰殿建福宫惠风亭陈设档》（道光十九年六月日立）建福宫目录下有黄条记录：“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小太监平顺传旨，重华宫交来《鸟谱》四匣计十二册、《兽谱》二匣计六册移安漱芳斋。”其前一页贴有纸条，上面写有：“若对至《鸟谱》二册时，想着查漱芳斋账是否入过其处，方为妥协，慎之慎之。”^[8]可见《兽谱》完成后，最初与《鸟谱》一起存放在重华宫；咸丰四年三月移放至漱芳斋；咸丰四年之后又先后移至建福宫和斋宫。“教育部清点委员会”签和“教育部点验之章”，是1934年为了躲避日军入侵，文物南迁，至上海核对时所用签印。这说明《兽谱》当时虽已离宫，但未离群，仍属于故宫管理范围。《兽谱》于1950年以后回到故宫博物院，一直保藏至今。《清档》记载《兽谱》原有匣两个，现已不知流落何方。

四 《兽谱》与《古今图书集成》的异同

《兽谱》中兽的名称和形象都采自《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古今图书集成》由康熙时进士陈梦雷编成。从康熙三十三年（1700）开始编纂，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才完

成初稿。十年后，上呈康熙帝。康熙帝将原来书名《古今图书汇编》改成《古今图书集成》，并请一些著名文人来重加编校。全书共6109部，10000卷，5000册。雍正帝称赞其书：“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兽谱》与《古今图书集成》^[9]中的畜兽，形象、数量一致，但又稍有不同。1. 在排序上个别有调换。如“罽”和“双双”前后排序有变。“罽”，《兽谱》中排在第一册第十幅，《古今图书集成》排在第一百一十九幅；“双双”，《兽谱》中排在第四册第二十九幅，《古今图书集成》排在第一百五十九幅；“狙如”、“狹”，《兽谱》中排在第五册第二十八、二十九幅，《古今图书集成》置换；“利未亚州狮子”在《兽谱》中排在第六册第九幅，《古今图书集成》排在第九幅；狮子不产自中国，《兽谱》后跋：“其序自瑞兽至异国兽，各以类次。”说明凡是异国兽，《兽谱》都放在最后一册中。2. 在兽的名称上稍有区别。如第二册中的第二幅“貍”和第三幅“貓”，在《古今图书集成》里叫“狗獾”和“猪獾”。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兽二·獾》：“貓，猪獾也；獾，狗獾也。二种相似而略殊。”在兽名称写法上稍微不同。《兽谱》第二册中的二十二幅“果然”，《古今图书集成》里标注“猓獾”。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各种瑞兽、异兽和普通畜类图画均为墨笔，有的兽有衬景，有的则无；而《兽谱》均为彩绘，每兽必配衬景。二部图谱中的动物造型大同小异，少有差别。

五 《石渠宝笈续编》中《兽谱》的著录

《石渠宝笈续编》第五册重华宫《兽谱》：

余省、张为邦合画兽谱六册。（本幅）绢本，六册，

[7]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2编，第1册，“斋宫”，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二十五日刊行，现藏故宫博物院。

[8] 《清宫陈设档·抚辰殿建福宫惠风亭陈设档》，第30页，现藏故宫博物院。

[9]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63551页至64217页，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放在第二十二幅。

第四册,《石渠宝笈》记畜兽有二十九幅,《兽谱》中为三十幅。《石渠宝笈》中把“双双”兽放在第六册,《兽谱》中放在第二十九幅。

第六册,《石渠宝笈》记畜兽有三十二幅,《兽谱》中为三十幅。《石渠宝笈》把“果然”、“双双”二兽放在第六册,《兽谱》中把“果然”、“双双”二兽放在第二、四册中。

兽名有误:第四册中的第二十二幅,《石渠宝笈》标名为“獨狝”,而《古今图书集成》和《兽谱》标名为“独狝”;第五册中的第五幅“獬獬”为《石渠宝笈》标名,而《古今图书集成》和《兽谱》标名“獬獬”。

以上经核对《石渠宝笈续编》前著兽属一百八十三幅,后题跋中又记一百八十幅,数字统计前后矛盾。实际《石渠宝笈续编》写出兽名称为一百八十幅,与《兽谱》和《古今图书集成》数量相符。《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错误的原因应是笔误。《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有这样的记载:“谕内阁,朕前命纂办《石渠宝笈续编》,以南书房翰林英和、黄钺、姚文田三人董其事,复于翰林中遴派吴其彦等八人,随同编辑。书成时,英和自请捐资缮录陈设本十分,并因伊所管事务较繁,奏明不能自行校对,仍责成吴其彦等八人分册详校,各于卷后注明何人恭校,以免推诿。嗣于装潢进呈后,将乙部一分陈设御园,以备披览。朕于幾馀,不时检阅,借以遣暇。此内吴其彦、张鳞、吴信中所校各册,讹误尚少。其余字画脱落,偏旁错误,经朕逐条签出者,每册多有。惟龙汝言所校,已积至百余处,均发交南书房随时更正,从未加以谴责。昨阅至第二十函第一册内,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帝’字脱落,非寻常错误可比,不可不加以惩处。英和虽未能自校,亦难辞咎,着罚

尚书俸三年。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粗疏,无庸交部议处,着即革职回籍。”^[11]可见《石渠宝笈》著录里是有错误的。

六 《兽谱》的作者

《兽谱》的作者为余省和张为邦二人。

余省,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之后。字曾三,号鲁亭,常熟(今属江苏)人。余珣之子。自幼从父习画,妙于花鸟写生。后师法宫廷词臣画家蒋廷锡学画,并在海望家长居二十余年。海望在雍正朝官至户部侍郎并总管内务府,乾隆时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余省进入内廷应该与海望的推荐有关。余省与其弟余穉两人于乾隆二年(1737)同时进入宫廷作画。乾隆时画画人中,余省被列为一等。他擅画花鸟虫鱼。所画作品,既继承历代写生画传统,又带有西洋画的格调,造型准确而富于生趣;设色艳丽饱满,以色彩的浓淡变化,延伸了空间的伸缩感,具有空灵高洁之气。

张为邦,又作维邦,生卒年不详,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父张震,约在康熙时入内廷以画供奉。张为邦在雍正、乾隆时在宫中供职。其子张廷彦则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祖孙三代相承袭。张为邦擅长画人物、楼观、花鸟及动物等,在乾隆朝画画人中被列为二等。张为邦曾随郎世宁等外国画家学习西洋画技法,从而将西洋画的技法融入到创作中,敷色的运用生动自然。郎世宁是清宫西洋画的创始人和传播者,张为邦是他的高足之一,二人合绘作品在《清档》中多有记载。

余省、张为邦虽都是宫中画画人,但各有师承,互有长短,作风各异,功力不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笔法工整细腻,设色富丽艳美,造型注重法度、规制、准确度。其画

[11] 《清仁宗实录》第5册,第 730—731,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据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五年所作《怀旧》诗云：“公(傅恒)在纶扉二十三年，日侍帷幄，恭诚素著，年未五十，鞠躬尽瘁以丧，其伤惜之。”又，《清史稿》卷三百一《傅恒传》中也有记载他“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由此可知傅恒死时未满五十岁。《清代人物传稿》上册，第十卷，第73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13] 《清史稿》卷三百一，第1045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4] 《清史列传》卷二十，第148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风的养成，受到乾隆帝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欣赏趣味的制约，与其长期服务于豪华富丽的宫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兽谱》是二者合作的一部力作。

七 《兽谱》的校勘者

《兽谱》校勘者共八位，即傅恒、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均为朝中重臣，在乾隆朝政治、军事、文化事业中均有重要贡献。以八大臣作校勘者，为图谱增重，尤见乾隆帝对御制《兽谱》的重视程度。

傅恒，生年不详^[12]，卒于1770年。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他的姐姐为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他历任圆明园总管，户部右侍郎、左侍郎，户部尚书，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他是乾隆朝深受赏识信任的重臣，也是有清一代宰辅中真正加衔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的极少数人之一。乾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才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13]他为清廷效命多在军事方面，受命平定金川之役胜利，乾隆帝特地颁诏嘉奖，“赐给傅恒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14]。傅恒参与不少军政大事的决策，在决定是否出兵准噶尔、平定达瓦齐的过程中，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其图像列为紫光阁百名文武功臣之首。他被任命为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的正总裁。1770年傅恒在征缅之战中死于瘟疫，年龄不到五十岁。死后入贤良祠祭祀，加谥“文忠”。

刘统勋(1700—1773)，字尔纯，号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历任刑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诸城刘氏一门有多人入仕，但以刘统勋及其子刘墉之名最著。刘统勋死后，乾隆亲临其家视丧，见其家室俭素，为之感动，晋其为太傅，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朝廷赐其子刘墉《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敬重其父。刘统勋学问渊深，曾受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充国史馆总裁、四库全书馆总裁。他居官五十余年，位宠不衰，以汉人馆阁重臣，仅次于傅恒，位列校勘者次席。

兆惠(1708—1764)，字和甫，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他是雍正帝生母恭仁皇后族孙。其父佛标，官至都统、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兆惠在二十四岁时初登仕途，先以笔帖式的身份入值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他历任刑部右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作为乾隆朝的著名统帅，他屡次征伐，先后参与平定大小金川战役、平定厄鲁特人入侵、平定伊犁、平定准噶尔等，为捍卫西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建立了功勋。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兆惠率西征军奏凯回京，乾隆帝亲临良乡，“于城南行郊劳礼”，对他大加抚慰，赏赐御用朝珠与良马，并和兆惠一同回城。他逝世时，皇帝亲临其家祭奠，当即把公主许配给其子扎兰泰，并赋诗悼念，又下令加恩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以“文襄”谥之。兆惠的图像被挂在紫光阁陈列。

阿里衮(?—1777)，钮祜禄氏，字松崖，满洲正白旗人。历任两广总督、军机处行走、兵部尚书、正红旗蒙古都统、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在平定大小和卓木及平缅之战中立有战功。谥“襄壮”，入祀贤良祠。阿里衮的图像被张挂在紫光阁。

刘纶(1711—1773)，字如叔，号绳庵，又号春涵，江苏武进人。1736年，清廷重开博学鸿词特科，刘以廩生举试，得中第一。试毕，即授翰林院编修。在其后数年间，累次升迁，先后在礼部、工部、兵部、户部任侍郎，官至尚书及协办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多年，由翰墨文臣转为理政重臣。刘纶诗文俱佳，故屡次奉命修撰官书，任四库全书馆总裁。他在去世的前一年，将其文稿编为《绳庵内外集》二十四卷。

舒赫德(1711—1777)，字伯容，号明亭，姓舒穆鲁氏，吉林珲春人，籍隶满洲正白旗。他精通满、汉两种文字，熟谙经籍，能用汉文作诗，也能将汉字书牍译成精确的满文。曾长期充任上书房师傅，教习乾隆帝诸子。他曾历任要职，诸如浙江巡抚、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馆总裁。舒赫德的前半生是在京城度过的，由笔帖式升到内阁及军机处中书，此后即长期辗转各地，戎马半生。他曾随傅恒入川平定大小金川之乱；随兆惠征讨南疆，在平定喀什噶尔后，他任驻阿克苏参赞大臣两年。1748到1754年和1773到1777年两度担任军机大臣。皇帝离京期间，他受命处理军国政务。死后赐谥“文襄”，入祀贤良祠。

阿桂(1717—1797)，字广庭，号云岩，姓章佳氏，原籍满洲正蓝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达官显贵之家，父亲阿克敦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很受乾隆帝的器重。他自幼聪敏过人，“闻人谈史事，即了了，能记其大略”^[15]。他曾历任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一生与乾隆朝四次重大战役有关：征服伊犁和南疆、平定金川、抚定台湾及尼泊尔之战，因此被图形于紫光阁，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于敏中(1714—1780)，字重常，号叔子、耐圃，江苏金坛人。他出身宦门，曾祖于嗣昌曾任山西襄垣县知县，祖父于汉翔曾督陕西学政，其父于树范当过浙江宣平县知县。于敏中二十四岁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学习满语，熟悉衙门的历史与职能。他历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1773年，刘统勋、刘纶卒后，他即为首席军机大臣。此后六年半中，他是当朝第一权臣。据说，乾隆召见他时，经常吟出诗作，而于敏中则须在事后凭记忆录下并编辑成册。这是一件很难做的差使，于敏中很少发生错漏。其前任张廷玉、刘纶及汪由敦亦曾显示过同样的才能，像他一样帮助皇帝编纂诗集。无论在京城或出巡外地，于敏中经常随侍乾隆左右，乾隆中叶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乾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做出的。除参与朝政之外，于敏中还主持编纂过乾隆朝大量官修图书，任《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总裁、三通馆总裁。其图像绘于紫光阁，与金川之役诸战将并列。又赐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此等荣耀赐予汉员文官即自于敏中始。死后，诏谥“文襄”，入祀贤良祠。

清宫兽谱

于敏中(1714—1780)，字重常，号叔子、耐圃，江苏金坛人。他出身宦门，曾祖于嗣昌曾任山西襄垣县知县，祖父于汉翔曾督陕西学政，其父于树范当过浙江宣平县知县。于敏中二十四岁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供职七年，学习满语，熟悉衙门的历史与职能。他历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1773年，刘统勋、刘纶卒后，他即为首席军机大臣。此后六年半中，他是当朝第一权臣。据说，乾隆召见他时，经常吟出诗作，而于敏中则须在事后凭记忆录下并编辑成册。这是一件很难做的差使，于敏中很少发生错漏。其前任张廷玉、刘纶及汪由敦亦曾显示过同样的才能，像他一样帮助皇帝编纂诗集。无论在京城或出巡外地，于敏中经常随侍乾隆左右，乾隆中叶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乾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做出的。除参与朝政之外，于敏中还主持编纂过乾隆朝大量官修图书，任《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总裁、三通馆总裁。其图像绘于紫光阁，与金川之役诸战将并列。又赐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此等荣耀赐予汉员文官即自于敏中始。死后，诏谥“文襄”，入祀贤良祠。

从以上八大臣均在军机处任职，而《兽谱》正是乾隆帝命军机处组织实施并完成的，因此，由这八大臣负责《兽谱》的校勘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乾隆帝将《兽谱》的绘制任务交给军机处负责，这也显示了乾隆帝对《兽谱》的高度重视。

八 《兽谱》的价值和意义

1. 科学价值

《兽谱》的宗旨是将当时所能知道的兽类全部汇集一处，并加以介绍。细分起来，其中所绘的兽有三种，即神

[15] 钱仪吉《碑传集》卷二十八，嘉兴，阿桂行状，贵筑黄彭年编订本。

兽、普通兽和异国兽。

“神兽”又可分为“瑞兽”和“怪兽”两种。“瑞兽”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能带来祥瑞的兽,如“麒麟”等。古人认为,凡统治者顺乎天意,就能导致年景风调雨顺,社会安定昌盛,于是就会有奇禽瑞兽出现,以示天兆吉祥。“怪兽”是《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神怪之兽,如“乘黄”、“九尾狐”等。二者均是仅见于传说而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兽谱》保留了它们的形象,也只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没有科学上的认知价值。

然而《兽谱》并未对古籍所载的神怪之兽全盘收录,那些过于怪诞的,如《山海经》中所载的“祸斗”、“黑九”、“凿齿”等,均未录入。其后跋曰:“绘事所垂,悉皆征实,岂郭璞《山海经注》之务探隐怪、《西京上林兽簿》之徒夸罗致所能仿佛哉?”虽然“悉皆征实”没有完全做到,但其初衷还是要与“务探隐怪”和“徒夸罗致”尽量保持距离的。这种模糊的认识也反映了当时人在动物学方面的真实认知情况。

“普通兽”是《兽谱》描绘最多的。其中既有常见的家畜牛、羊、狗、猪、兔,猛兽狼、豹、虎、熊等,亦有较为珍稀的貘、貔貅等。“异国兽”则是外国出产的兽,如“般第狗”、“亚细亚州山羊”、“利未亚狮子”等。这种兽大多是由外国使节朝贡时奉献给清廷统治者的。由于普通兽和异国兽是在“悉皆征实”的基础上绘制的,加之以较详细的文字说明,二者对于今天的动物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尤其是那些现已灭绝的动物,通过图谱仍可见其原貌及生存状态。

2. 艺术价值

《兽谱》把动物内在的或温顺或凶猛或狡猾的种种

习性,都刻画得淋漓尽致:或憨态可掬,或尖牙利爪,或威风凛凛,或奋蹄疾驰,或延膊缓步,或虎视眈眈,或停蹄凝望;更佐以崖壁石脚、重岭叠嶂、丛树环抱、云烟吞吐、水泽苇草等背景,可谓百态纷呈,无影不备,使人目睹其形,似闻其声。其画法以精勾细染以表现各种动物的外在面貌,又融入西洋画法,注意透视明暗,画风细腻,色彩富丽。如图中麒麟、獬豸、白泽等,二只回首仰望,一只目视前方,姿态奔放,张口睁目,目光犀利;其皮毛爽丽,首、尾毛长华美。画家用细线精心描绘兽的茸毛,再以细笔勾画长毛,使兽毛质感蓬松;又通过敷色晕染的深浅变化,显示动物皮毛的层次和质感,使所画之兽神形兼备,惟妙惟肖。画面中山川、飞瀑、云雾、杂树点缀其间,与畜兽对比强烈,疏密得当,动静有致,充满了生趣。因此,画作亦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

小结

《兽谱》是在乾隆皇帝谕令和监督下,由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精心绘制,傅恒等军机大臣认真勘误、标识,经十余年才得以完成的一部动物图谱巨作。它是清代宫廷绘画的一部分。而其专以兽类为表现对象所绘制的百余幅图谱,不仅在清代宫廷绘画中独一无二,在中国历代宫廷及民间绘画上也是前所未有之作。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和动物谱志上,均具有独辟蹊径的开创性意义,为今人研究清代宫廷绘画和当时动物学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

袁杰